

面對「明日之戰」 中國如何助力世界前行？

科勒德克是一位視野開闊、具有獨立思維的經濟學家，他曾以政治家（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身份，帶領波蘭經濟轉型並成功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盟。科勒德克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敏銳觀察者，他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它就是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他也批評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性分配不公。科勒德克著述頗豐，出版過50多部經濟學專著，發表過關於政治經濟改革400餘篇專業論文，並獲得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獎提名。《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科勒德克的著作和文論常常成為全球化政治經濟討論和辯論的重要出發點。

世界將走向何方？

在世界主流觀點和普遍共識中，關於「世界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取決於西方將在何種程度上證明自己。當下人們可以看到，西方無法證明自己能夠正確地領導新一輪的「明日之戰」，因為它未能化解基本的文明挑戰，也無法確保整個人類，甚至西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要有效地確保這種「合理性」，需要面對三個時代的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關聯，必須同時解決。

在科勒德克看來，「要想解決作為文明生存和發展必要條件的存在合理性問題，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必須具有共同體意識。」這是全球化的要求，而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隨着觀察和研究的深入，科勒德克發現：現在之所以出現許多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在上一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政治全球化還處於起步階段」。世界經濟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的，但沒有實體來操縱它。認為有市場就足夠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引導和管理經濟資源及其流動的實體和機構。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西方還無人介入，更無法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

很顯然，如果出現能夠長期引導經濟進程和有利於共同體行動的機制，人們同時創造性地利用科技進步的巨大成果，就能改變這種狀況。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理論上是存在解決辦法的，世界經濟必須重新制度化。有必要將市場機制的力量與規章制度的力量結合起來，

現為波蘭華沙科茲基斯大馬路政治經濟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和新興市場研究院特聘教授的格澤高茲·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他就曾多次到訪中國或在中國做學術交流。科勒德克表示，自己是中國經濟的推銷員。作為長跑愛好者，科勒德克甚至還參加過北京的馬拉松，他堅信「長距離是非常好的思考方式」。

科勒德克的新著《中國能否拯救世界？》（Will China Save the World；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正是結合他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從經濟與安全、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比較、人口與貨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性等視角，對中國經濟乃至未來世界發展變化的格局進行了「長距離思考」。

而後者必須依靠尚在發展的各國聯合的全球化制度化，而非僅依賴於某一個國家。這一任務能否成功完成，在未來幾十年間，在文明處於下一個十字路口時，或許可見分曉。

「中國主義」的可能

在為明日而戰時，任何人都應該被輕視，但也不應該被高估。

科勒德克把我們共享的全球化比作藝術畫廊。他發現，當今世界，人們正在繪製兩幅相互矛盾的圖畫。在第一幅畫中，帝國主義，即西方資本主義，應該被東方的「共產主義」所取代。這是一種獨特的視角，還是一種極端的非理性？因為中國既沒有共產主義，也沒有試圖主宰世界。在第二幅畫中，中國被認為能夠幫助世界解決經濟與環境的諸多問題，因為中國具有長期和全面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自私地關注自身利益。

價值觀的差異、利益的衝突、模稜兩可的境況、不明確的意圖都會導致對同一類事實的解釋大相逕庭。其實，世界並不會靠中國或者靠一兩個大國拯救，關鍵靠一種新的觀念，要發明一種新的價值體系，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就是科勒德克在書中提出的所謂「第三種主義」，用他的解釋叫作新實用主義，以中國為案例，又標為「中國主義」。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科勒德克認為「中國主義」凸顯兩大特色。第一，中國將在塑造新的全球制度秩序方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在過去40多年中由於高效的生產力，中國經濟在全球生產中所佔的份額顯著快速增長一樣，在未來幾十年，中

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將迅速顯著提高，這在某種意義上比在經濟增速上形成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超越更為重要。

第二，對許多全球政治和經濟形勢觀察家來說，中國成為以自由貿易或資本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的倡導者，是令人驚訝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迄今為止，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將全球化轉化為優勢，通過政府支持的出口促進經濟發展（充分利用凱恩斯政策工具，不少經濟學家會如此補充）。中國不可能反對全球化，相反，大多全球化的反對者來自富裕的歐美國家。

展望未來，不難看到中國日益增強的作用。比如，由「一帶一路」建設所帶來的中國影響力正在將世界的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兩岸的北美和歐洲轉移到以中國經濟為驅動力的亞洲。科勒德克由此認定：「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塑造未來世界的理想面貌，限制日益加劇的全球化威脅，同時降低經濟及各個領域的災難性風險。世界不應害怕中國，而應該相信中國。中國可能不會拯救世界，但可以幫助世界前行，避免翻車。」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歷史及延伸的未來遠比我們想像的豐富，甚至錯綜複雜。面對「明日之戰」中國如何助力世界前行，也許這是科勒德克給予世人的另一思考。

制度如同膽固醇

窮國之所以貧窮，主要是因為它們沒有掌握管理經濟和調節經濟進程的技能。科勒德克由此頗為贊同



格澤高茲·W.科勒德克 (Grzegorz W.Kolodko) 來源：Wikipedia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所提出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缺陷是造成經濟狀況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觀點。

基於此，科勒德克毫不諱言地指出，「制度將是未來之戰（『明日之戰』）的主要內容。」他甚至把「制度」和「膽固醇」作了形象比喻。

就像在生物體的血液中可能會出現膽固醇過少或過多的情況一樣，在社會經濟中，對於生產和儲備、分配和銷售，儲蓄和投資、銀行和金融、企業和國家，都可能有過少或者過多的機構。此外，就像膽固醇有好壞之分一樣，機構也有好有壞。因此，並不是每一次制度變遷都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均衡，有時正好相反。如果行政干預和監管不是為了積累資本和優化資本配置，而是為了幫助官僚化和腐敗的國家機器，讓臭名昭著的官員和政治精英去攫取經濟活動的集體成果，那麼這就像壞膽固醇。體內缺乏好膽固醇，或者壞膽固醇增多時，機體會受到影響。如果國家的監管職能薄弱，允許不道德的商人、聲名狼藉的資本家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科勒德克為不忘提醒國人：在當代中國，這種制度風險是非常高的，因為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最終解決。考慮到現在經濟體制並不成熟，以及經濟監管領域的諸多變化，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監管過度，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會導致監管不足。很難說這兩種情況哪個對中國會構成更大的威脅，都應加以注意。

書介

走路的人，河正宇

作者：河正宇
攝影：河正宇
譯者：王品涵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走路去經紀公司、走路去拍片現場、走路去金浦機場，一日三萬步是他的日常，他說：走路，就是休息。億萬票房巨星每天走路上班，許多人最初聽到都覺得不可思議。河正宇回想自己開始走路，或許是因為他曾經有一段時期能做的事情只剩下「走路」。河正宇的父親是知名演員，這讓他一出道就比別人認清：這個行業，外形跟實力一樣重要。為了怕被當作星二代，他改姓更名，不斷挑戰。變態兇手、騙子、殺手、壞蛋……他都能接。但他仍然有過茫然沒有未來的長期歲月。那段日子，他畫畫，並走路。他還用行走鼓勵後輩，闡釋人生：「走路後，我明白了世上沒有錯誤的路，有的只是稍微遲來與崎嶇的路罷了。」藏語中，「人」這個詞的意思是「行走的存在」或是「邊走邊彷徨的存在」。河正宇以此勉勵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個不停行走的人，無論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放棄能夠更進一步的人。

競爭之死

作者：強納森·坦伯、丹妮絲·赫恩
譯者：吳慧珍、曹嫻恆
出版：周周出版



《金融時報》年度最佳經濟類選書。本書以輕鬆的筆調、扎實的數據與圖表說明，為何壟斷橫行、缺乏競爭的資本主義，會造成物價高漲、工資停滯、貧富差距擴大、創新貧乏、生產力不振等惡果。作者更直言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數據與結論都是錯的，皮凱提認為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經濟）成長緩慢，但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等組織的研究卻不支持這樣的論點。作者認為，不均等之所以惡化正是因為市場變得集中，缺乏競爭，才讓富人愈富。作者的分析一針見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與矛盾，有同以往的全新洞見，並提出強而有力的建議，讓我們得以扭轉弊端，回到更高的經濟成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薪資和人人都可公平競爭的時代。

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

作者：彼得·梵科潘
譯者：苑默文
出版：聯經出版



兩千年來，絲綢之路始終主宰人類文明的進程，南轅北轍的文化在此碰撞震盪，並以此為中心輻散到世界各地。牛津大學重量級史學家彼得·梵科潘重新解讀世界史。《絲綢之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切入，以絢爛奪目的方式，探索讓古老帝國盛起與毀滅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也決定人類思想的發展以及世界財富的流動，現在更預告了種種國際事務的新開端。

創作《重症監護室》 湖北作家周芳： 我們還好，正全心抗疫

簡訊



作家周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導）「有人正在死去，有人從死亡線上跑回來，重新學會呼吸，呼吸是唯一的事情。」去年，湖北孝感作家周芳創作的長



篇非虛構作品《重症監護室》面對生命的脆弱、死亡近在咫尺的逼仄場所，去關注「那些戰鬥在臨床一線的醫護人員，在疾病和死亡逼近時，用他們的醫術、愛心、信念，如何挽救一個個瀕危的生命」的一個個場景，去面對一個個痛苦的人、絕望的人與死神搏鬥的呻吟或者哀嚎，同時也完成了從一個暈血症患者在司空見慣的痛苦中轉變成為一個「女漢子」的過程，她也就更真切地體會到活着實在不易。

如今孝感作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災區，孝感人民的生活狀況牽動着大家的心，曾與醫院那麼「近」的周芳現在可好？疫情期間記者聯繫上周芳時，她正在湖北孝感的家中，向讀者報來平安。「目前我們還好，正全心抗疫！大家的掛念給了我們最大的力量和慰藉。致敬平凡而堅強的人們，保重！」

在創作《重症監護室》前，她深入醫院做義工長達一年。這本書可以說是作家通過一天一天的目擊，一件一件的記錄，去「認識生命的猶疑與不確定」，去直面痛苦與死亡、糾結與虛無、無奈與盡力，並因此懂得更加珍惜人生的一份真切記錄。全書聚焦於這樣的感動：「為了『活着』，有多

少人在默默付出。」

周芳在重症監護室這個天天面對生命的脆弱、死亡近在咫尺的逼仄場所，去關注「那些戰鬥在臨床一線的醫護人員，在疾病和死亡逼近時，用他們的醫術、愛心、信念，如何挽救一個個瀕危的生命」的一個個場景，去面對一個個痛苦的人、絕望的人與死神搏鬥的呻吟或者哀嚎，同時也完成了從一個暈血症患者在司空見慣的痛苦中轉變成為一個「女漢子」的過程，她也就更真切地體會到活着實在不易。

2019年，周芳曾赴上海參加了《重症監護室》新書分享會，在講起關於生命的感悟時，她潸然淚下，用一個個親歷的故事感染了現場的所有讀者。

事實上，周芳除了是一名作家，還是醫院附屬護士學校的語文老師。目前她所在的學校已經開線線上授課，她回憶記者，「第一次和學生們上網課。網上點名。我說，周芳在。學生們一個接一個說——在。忽然，淚水就落了一臉。我們不會投降。」

還原當下台灣文學現場

——讀古遠清《台灣新世紀文學史》

書評

古遠清以研究華文文學著稱於學術界。他和劉登翰一起被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稱為最有影響力的台港文學研究者。與劉登翰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私家治史路線，且不以微觀研究行世，而以境外文學史撰寫著稱。《台灣新世紀文學史》，便是他獨立寫作出版的第八部文學史。

千禧年鐘聲的敲響，帶給人們的不光是物理時間上的新起跑線，更蘊含着人們對台灣新世紀文學的希冀與期望。作為一位有20年「工齡」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且偶爾寫點文章參與台灣文學壇論爭的大陸學人古遠清，他感到越來越需要研究新世紀台灣文學有哪些新氣象、新情況，尤其是當民主選舉成為台灣「聖牛」情勢下的當前文學，對正在自我矮化、自我村落化、鼓吹用「台語」取代漢語、用「華人」取代「中國人」的本土文壇，的確需要跟蹤書寫。

在內地學界，新世紀文學是一個熱門話題，可對台灣新世紀文學，鮮有人問津。就是對岸的學術界，也沒有人做這方面的系統研究。可以說，基於對新世紀文學研究現狀尋求格局的改觀和獲取新的學術生長點，是古遠清寫作《台灣新世紀文學史》的主要動力。

台灣文學研究本不應陳陳相因，而應在創新上下功夫。在《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序言中，古遠清開宗明義「用政治天線接收台灣文學頻道」做標題。也就是說，基於台灣新世紀文學與政治難解難分的關係，古遠清對以往的純文學研究方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研究台灣文學尤其是新世紀文學，不能只有審美標尺，還應該用「政治文藝學」的方法去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台灣新世紀文學的特質，才能把握台灣新世紀文學與上世紀文學的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古遠清概括為：「新台灣寫實」及新鄉土小說的誕生、「後

遺民寫作」、奇幻文學風潮、小說中出現的「後人類」情景、典範轉移與作家全集出版、《台灣文藝》吹熄燈號、副刊的娛樂性和話題性在擠壓文學性、散文與小說界限不清、「同志文學」熱潮降溫、後殖民理論攻、國民黨選台一甲子的歷史記憶以及馬華作家在台灣的論述。所有這些，導致「台灣新世紀文學」和20世紀台灣文學的不同在於期盼從文本到語言的激烈變革；期盼副刊格局不再固定於《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本土；期盼從形象塑造到文壇結構的重新洗牌；期盼用散文尤其是回憶錄去取代小說的霸主地位；期盼長篇小說時代的來臨；總之是期盼突破上世紀文學的規範和權力分配，期盼在創作上尋找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表達方式。

寫文學史，不僅要有出色的史筆，而且更重要的是應有新穎的史觀。是這種史觀，決定一本書品質的高下和優劣。目前在台灣最流行的是本土史觀，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新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文學。可是當古遠清回溯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歷程，尤其是新世紀出現的後遺民寫作、回憶錄寫作潮時，發現這種單一的本土史觀會帶來的諸多局限與制約。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古遠清堅持大陸學者的立場，同時立足於台灣新世紀文學本身，使他能有效地還原當下台灣文學現場，破除後現代後殖民這些西方文藝理論對台灣文學研究宰制所帶來的尷尬，廓清種種本土化理論的迷思與遮蔽，從而接近台灣新世紀文學發展的原貌，真正實現將分流的兩岸文學加以整合。關於這一



點，在《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導論的第三節《兩岸文學，各自表述》，已有生動闡明。正是基於內地視角和內地主體性的堅持，才有《三分天下的台灣文壇》《由「台灣的文學年鑒」到「台灣文學的年鑒」》《「台語文學」的內部敵人》這些精彩篇章的產生。

《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另一特點是不受「大敘事」的局限，注意細節的發掘與展示。古遠清靠《印刻文學生

活志 INK》中的「印刻」之名的由來這些細節，編織出多層次的文學史現象。這是一本有故事的文學史，如「文學事件」中對杜十三「行為藝術」的敘述，對「上官鼎」這位武俠小說家筆名的解讀及其代表作的分析，還有稗官野史的運用，貌似守舊，卻讓這部文學史生動有趣，讀起來不至於枯燥無味。

總之，古遠清用真誠、善意、犀利的文筆，記錄與評價新世紀台灣文壇湧湧而來的政治小說、波瀾壯闊的回憶錄以及長流不盡的各種創作。他用一顆雖然中帶有迷惘但決非沮喪的心，書寫着台灣新世紀文學走過的旅程，其中包括收穫、焦慮、爭辯、遺憾與歌哭、欣喜和感動。這裡有電閃雷鳴般的文學事件，更有雲淡風輕般的審美愉悅。從彼岸走向此岸，從台灣返歸內地。古遠清將這部分上、下冊且全精裝的《台灣新世紀文學史》，獻給台灣的文壇、詩友，以及所有關注台灣文壇最新動向的學者和讀者。

文：曹竹青